



吴
菲

做记者是多年梦想，但接近得并不容易。1996年2月进北京青年报学习做新闻。1997年10月才成为正式一员。

做访谈记者却是天意垂赐。那年冬天“热点访谈”版的首创记者赵维要去参加“凤凰千禧之旅”，一周一出的版，部门主任刘鹤急着找人替手，有一天一抬眼看见了我：“对了，正好你闲着哪，你来吧。”1999年11月我做了第一篇访谈，访的是正官司缠身的刘晓庆。然后是司马南、张丽玲、冯小刚、柯云路……两个月后赵维回来了，我以为缘尽，做了一篇王朔来跟这个版告别。

没想到4个月后我得到机会正式接手这个版，2000年5月3日我用一个对刘恒的访谈来为此开篇，用的是我最喜欢的那类标题——《悲观者最温情》。然后开始幸福地做一个访谈记者至今。2001年7月至2002年10月间，“吴菲访谈”一度是北青报一个版名。后来成为了副刊“人物在线”版一个栏目的名字。

一直对北青报、对所有在这个过程中看顾和容让过我们的人心存感激。

因为对于我来说，做访谈的绝佳之处一如我现在很迷恋的登山，你可以——站到高处，看见风景。

工作是我自己可以掌握的一个东西，我努力就有回报的。但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感情，就不一定。所以还是工作最实际，我要保证它稳定，那样我做人就会比较有自信。但在我来说最重要的依然是：我喜欢的人喜欢我。

——闫丘露薇

闫丘露薇：

生命中可把握的惟有工作



闫 丘 露 薇

凤凰卫视记者、主持人。

生于上海。199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后移居香港。1999年在香港浸会大学取得传播硕士学位。

1997年加入凤凰卫视。曾采访多项大型活动。近年尤以战地采访声名鹊起。2001年“9·11”事件后，三度赴阿富汗采访，成为第一位进入阿富汗的华人女记者。此次又成为进入伊拉克战地的中国记者

第一人，也是开战后返回战火巴格达的全球媒体第一人。

现为凤凰卫视采访主任，负责安排香港采编中心的采访工作。

5月8日，在阜城门桥西的国宾酒店采访闫丘露薇。

晚上8点半，五星级酒店的大堂人声寥寥，在跟拍了一整天研究抗非典疫苗的科学家之后，闫丘露薇就着一瓶矿泉水吃同事带回的一盒肯德基做晚饭。“觉得最难过的就是没地方吃饭，都关门了，要知道我喜欢吃的都是‘沸腾渔乡’那种。”在两月间丢了三四公斤体重，镜头下的闫丘露薇愈发身量细小得让人吃惊，虽然她说：“还好了，瘦了眼睛可以显得大一点。”但是我相信只要看到她，尤其听过她这个晚上那样真心地、不设防地说的那些话，每一个人都不会心疼。

这个春天，从两会到伊拉克再到北京非典，闫丘露薇没有休息过，也似乎总在人们目力所及。尤其3月24日战火燃起后的突入巴格达，和3月29日与央视记者一起撤出巴格达，几乎是万众瞩目。后来，至少是北京人的目光有点儿散掉了，因为生活中有了更突如其来事。她4月15日又重返巴格达直至29日才回香港的行踪，没有太多人知晓。直到5月1日凤凰卫视的“非典专题”《北京一日》，又看到她面容平静站在北京街头。仿佛一夜之间，战场倏忽变换，而闫丘总在前沿。



无论是巴格达战地还是在非典一线，都没必要搞得好像在献身一样，其实不过是尽你的职责，你不做谁做

记者：从巴格达撤回到北京做非典，是什么样的考虑？只要是前沿的东西就一定要有你？

阎丘：这要问我们公司，我听从命令。“非典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北京很多人这么说，我自己没这么想。

记者：那有这么一个细节：“在回答王岐山代市长‘我一直关注你的伊拉克报道，欢迎战地记者来北京采访’的

问候时，闫丘露薇表示，跟伊拉克战场一样，北京非典硝烟没有散尽，战地记者生涯就不会结束。”这是你的话吗？

闫丘：我想是我们公司对我态度的一个诠释吧。公司让我来这里，是他们觉得这里已经开始变成一个比伊拉克更受关注的战场。我想我接受这样一个看法，可能我自己不会讲这样的话，但是我理解。

其实这两天我自己也有一个感觉，在伊拉克你出什么事情或有什么危险，是你自己的事情。这一次我真的是有心理负担，比如说进病房，我是在想，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因为如果我有事，我是感染一大片的。你心里会很内疚，而且我觉得不值得。所以就会告诉自己说，你所有的步骤要跟齐，所有东西要戴好，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你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好别人。

就像到伊拉克这种战场去，其实到这里采访也是一样的，首先对这个病你一定要有基本的认识，就像你对战场要有一些基本认识一样。第二不能带着一个冒险的想法去做这个事情。应该想好怎么样更好地保护好自己，在这个前提之下去做，我想更好一点。

记者：我之所以追问那句话是不是你的表述，就是因为从我看资料对你的理解，我觉得这应该不是你的话，因为不是你的状态。

闫丘：是，没必要搞得好像大家在献身一样。其实不过是职责问题。你看那些医生护士，他们并不是抱着一种“我是一个英雄”、“我要做烈士”的想法才去做这件事的，这是他们的工作，你不做谁做？对于我来说也一样，因为我是记者，那这就是我应该做的工作。比如进巴格达，那

可能是我做，也可能是其他记者，我只不过比较巧，我去的时候战争爆发了。在我之前我们已经有两位同事到了那里，那完全有可能是他们在那里的时候战争爆发的，这些事情谁也不知道。我真的觉得这就是我的一份工作，是今天给我的一个工作安排，从本质来说，跟我到菜场去采访一个老太太是没有区别的。

记者：一个同行说：“做记者永远会向往新闻现场，尤其是重大新闻的现场。但是在现场一定是心境平和、喜怒不形于色、不畏惧也不莽撞的。我对闫丘最直觉上的喜欢就是这个层面的。她的勇敢也好智慧也好都不张扬。不职业让读者观众在新闻中看到他自己，职业让读者观众在报道中看到现场乃至看到幕后。”

闫丘：我蛮认同的，我觉得你不能把自己放在新闻的前面，你是呆在后面的，你应该让大家看到的是事实。记者，我从来觉得就不是让你来做裁判官的，记者就是让大家有个知情权。当我只是一个记者的时候，我是不应该把我当时的感受这样来告诉你的。当然，多多少少你肯定是有会有一个立场，我心里的立场也影响到我看到的東西，但是你一定要克制它。你不可能 100% 的客观，但是还是要往这个方向努力。

另外一点，做记者应该关心新闻本身，而不是关心自己。我进这一行的时候有一个很资深的导演一直跟我说：闫丘你要记着，在镜头面前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想自己，不要想自己怎么站漂亮，怎么讲话显得你有水平，你应该想的是你要说的事，你看到什么，现在要说什么，说的的时候就把自己忘掉。我觉得也是，我偶尔有时候一想到自己，

脑子就会乱，就不自然，那时候就没把握了。

记者：那你做这一行做了这么多年，这一点你一直没有迷失掉，你是尽量去克制还是……

闫丘：是习惯。我觉得改不了。



不应该骂水均益，也根本不该有“中国男记是否该感到耻辱”这种讨论，应该把这看成是“有中国记者到了巴格达”，这就足够了

记者：我们回避不掉的一件事，你一定也知道你在巴格达的时候你的这个“工作”引起了什么样的争论，网上甚至在讨论“中国男记是否该感到耻辱”，投赞成票的是61.4%。

闫丘：我到现在都觉得根本就不该这样讨论。没有这样一个性别的问题。这个从骨子里反映出还是不太平等。大家应该把这看成是“一个中国的记者去了”，这样已经足够。你到巴格达你看到有很多女记者，在西方从来不会有这样的讨论：哦，我们国家有一个女记者去了，我们国家的男记者到哪里去了。大家是尊重你的工作能力而不是看你的性别，这点很重要。可能慢慢会好的吧。

我也觉得不应该骂水均益。我们做新闻的风格完全不同，大家用的技巧不同，表达的方式不同，或者我不喜欢他的方式，我可以这么说，我不太喜欢他们用的那种。但我相信他是一个很敬业的记者。大家应该想一想他受的限

制比较多，我希望大家不要把他当成个人，以为好多事情是他个人可以决定的，我觉得这对他来说太不公平。因为我一直有跟他在一起，在那段时间。我觉得大家应该去理解他，我相信他只要是有机会，他只要是可以，他一定会一直留在那里的。他现在的压力实在是大，我觉得太不公平了。

记者：还有一种争论，我在一个电视节目里看到一位历经过波黑战争、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新华社高级记者的表达，他说：“已经有当地人在那儿，另外现在资讯很发达，外国电视台也有很多信息，我觉得应该尽量避免中国人在里面牺牲”而中青报沙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当我们的媒体在别人报道的基础上臧否战争时，我们是否想过，那些素材没有丝毫是我们自己用劳动和鲜血采集的。我们没

有为影响人类的突发性大事件做出相应的话语贡献的激情。”他觉得这是一个性格上的缺陷。

阎丘：你知道吗，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采访的时候，你会觉得作为一个华人记者你在里面很孤单的，好像什么都没你的事儿一样。你会觉得为什么当地的政府那么重视欧美的媒体，他们



要去约任何的访问人家都非常容易答应，而我们要去做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访问就那么地累。我现在感觉是华人媒体在参与报道这些国际大事件的时候根本引不起国际的重视，有华人媒体还进不到整个世界主流媒体里那个感觉。这一点你会觉得很伤心的。

为什么？我想就是因为以前没有想过要去有自己的一批记者，参与到这样的事情里面，用自己的视角。这一次在那边，我就觉得我有好多次的东西是比 BBC、CNN 还要快，我拍得比他们还要早，我做出来的东西跟他们第二天的东西再一比的话，我不比他们差，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声音引不起全世界这样一个重视？

你会看到这次非典，好像大家都争着要上去或者怎么样，也有可能是觉得跟我们近，是我们身边的事情。但我觉得是你身边的事情也好，离你很远的事情也好，只要它是一个国际关注的话题，为什么你不去报道不去参与，如果你想把自己提升到一个地位上去，要跟其他国家的、世界级的这些媒体大家站在一起的话？

记者：前不久你在接受一个采访时说：“华人比较重视生命，觉得让记者留在战场很不人道；西方人会尊敬战地记者，但认为他们留在战场是应该的。希望大家以后接受一个现实：一个记者在战地上采访就像一个士兵必须去打仗一样。”

阎丘：我这次回到香港，就有很多，比如外国记者协会，他们很希望我去跟他们聊，因为他们觉得很兴奋，觉得有华人的媒体去重视这些事情，派出记者去采访这些事情，他们觉得中国的媒体在发生改变，他们非常看重这些

东西。

我也觉得华人媒体已经有很大进步了。你看这一次巴格达，台湾的有媒体进了，马来西亚的，你看到一些其他的华人媒体开始到这个地方去了，你会觉得很高兴的，噢，有华人媒体愿意这样去做了。虽然大家不熟，也不打交道，但是你会看到，不单单是我们一个中国人、两个中国人在那里。



荣誉是过眼云烟，那是工作上的事情，对我个人的喜怒哀乐来说关系不大。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喜欢的人喜欢我

记者：那当你第一次听说内地为你这样讨论，第一反应是什么？

闫丘：我蛮惊讶的：啊，真的，居然有这种事？那时候觉得自己很遥远，任何在国内发生的讨论、任何的事都跟我没关系的。偶尔打电话回来他们会跟我说一两句，我说：真的？哦。就没什么感觉。

记者：你一下子变得可显眼了。

闫丘：但是我在那里不觉得。我觉得这很好，因为我很担心自己，如果当时我知道这样的反应的话，我也不能保证我再进行我的报道时心态会不会改变，会不会有一点骄傲啊这样一种感觉出来。我很怕自己会有这种感觉出来。我觉得还是兢兢业业做你的事，这样对一个记者来说是比

较好一点。

记者：有一次别人问到你关于做记者的素质，你说：“最重要的一点，作为一个电视台的记者来说，是不能让电视的诱惑把自己带坏了，要尊重新闻本身。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做得久了以后，就知道怎样偷懒，或者知道怎么利用镜头，或者利用你手里的机会来表现自己。”我觉得这种诱惑有的时候是挺难抵抗的。人都有虚荣心，那你是不断地提醒自己是吗？

闫丘：对，这我会提醒自己。我很感谢就是我的一个头儿，钟大年，广院的老师，他教学生教了几十年，他一直跟我说亲眼看过很多学生就是因为电视的诱惑就废了。我做这一行的第一个老板，他就跟我说：电视是过眼烟云，你不要把它看的太真，不要一下子给它蒙蔽了，觉得好像是怎样怎么样。我听了觉得“是啊”。

记者：你现在肯定已经是一个记者明星了。对于这种状态是什么感觉？

闫丘：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会想，我一直在兢兢业业工作，我觉得平时做了很多自己很满意的报道，更辛苦的东西，大家怎么就只记得我去伊拉克，那我平时那些工作都白做了？而且我觉得人很善忘的，我会跟自己说：噢，过三四个月大家就忘记了。

记者：不觉得过瘾吗，被大家喜欢，给你写那些诗一样赞美的话？

闫丘：很舒服，这个肯定是很舒服。但对我来说不重要，真的不重要。

记者：那什么重要？

阎丘：我这人可能比较自私，我会比较自我一点，我觉得对我最重要的是，我喜欢的人喜欢我。

至于其他那些是我工作上的事情，对我自己个人的喜怒哀乐来说关系不大。

当然有的时候对心情有帮助。回看几年前跟现在，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自己有点成功，然后人家认可你，我自己做人也自信了。至于出名，我的看法是，方便我以后采访。有人问过我做主持和做记者，喜欢哪个。我说我倒不是说是喜欢哪个，我觉得现实是你做了主持人，人家会增加对你的感受，人家会认识你的脸，当我再要去采访的时候，我会比一般的记者要容易。就像这次我在北京采访，很顺利啊，我去约世行的人，他们的首席经济学家是个印度人，他看到我都说“你回来啦”，我很惊讶，但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唔，是有好处啊。他本来说很忙，后来看到我的申请，看到我的名字，他马上就答应了。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东西，有的时候。



记者对我来说就是一份职业，因为我要养自己，我要养女儿。对别人来说可能是一种事业，而在我最现实的是我要靠它求温饱

记者：我觉得你对很多东西的看法都特别现实、朴素，而且本份，没有那么多的自我诗意化的成份，比如，即使

你做到现在这样，你也不像很多人习惯于赋予记者这个职业更多的道德感。

闫丘：我自己感觉是记者就是一份职业。每个职业对你有不同的要求，就像现在医生护士你要去救 SARS 病人，那记者，你就是各个场合都可能要去，包括战场。对我自己来说，我拿了这份工资，我做了这份工作，我的做人原则，就一定要尽我的力把它做到最好。并不是说为了满足我的什么崇高的理想，没有。你做了这份工作，你就应该把它做好，这是一个人的起码道德。

环境蛮重要的。我进这一行一直是在香港很系统的这些电视台，你从头做起，看着你那些师傅，大家都只是把这当成一个职业，兢兢业业在做。你在这样一个氛围中长大，就会有这样一个结果。香港这个地方做记者，不是一个像国内这样令人崇敬的职业。香港做记者就是普通的一份工，收入也属于是中低的，也不是说大家很向往的一份工作，这会让你自己保持比较清醒一点。我大部分时间在香港，你就会觉得你从事的是一个你跟很多人比，都比不上的一份职业。你走在香港街上，香港人如果认出你，也

只是“哦，读新闻，做记者的”，就这样，也不会觉得怎么样。这样一个环境会让你觉得你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这样很好。



记者：既然如此，以你的能力，为什么还选这份，用你刚才话来说，跟很多人比比不上、收入也中低的一份工作？

闫丘：那我觉得我从小喜欢啊，真的是从小理想。然后我觉得做这份工作到目前为止我是把我所有的优势都能发挥的，它最适合我。

我工作的时候跟我私下里是完全两个人，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困难，然后我也自信，在公司，因为在工作状态我跟每个人打交道我都很自信。但是如果我一个人，比如我一个人去逛街或者怎么样，我很糟糕的，我可能连，有的时候觉得自己路都不会走，或者说“快点躲起来”，那种感觉。自己不太自信。

记者：曾经有人问到你理想的生活，你说：“因为我在香港生活，每个人都很实际，我现在最要做的事情就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能养我的家，我的孩子，供我的房子，然后我才能想一想我自己希望过的生活。如果说我最希望我的生命中去做的事情，到目前来说还是工作。因为我自己都发现了很多次，一出差有东西做，我就变得特别精神。”

闫丘：到现在还是这样。我挺有危机感的。我做梦都会做到给公司炒鱿鱼，即使到现在也是这样。

记者：你现在很成功啊。

闫丘：不过还会担心，我做梦的时候会有这种担心。我把工作看得比较重，因为我真是觉得自己有负担，就是我要养自己，我要养女儿，那这份工作对我实在是太重要

了。对别人来说可能是一种事业，而我至少有一个前提是我要温饱，这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总结出来一个问题是，工作是我自己可以掌握的一个东西，我努力就有回报的，但其他的事情不会啊，其他的事情你再努力，比方说感情这些问题，你的努力不代表会获得回报的。所以我就觉得，唔，那还是工作最实际，首先我要保证我这个很稳定，这个稳定那我做人就会比较有自信，然后跟别人交往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跟你是平等的，我觉得这样状态比较好一点。



这份工作也满足我自己，让我自己觉得充实。如果我责任感很重的话，我应该放弃掉一部分给我充实的感觉，去花更多的时间跟我女儿在一起。但我做不到

记者：说到记者是从小理想，你说过：“小学的时候，我写的我的志愿真的是我要做记者。社会上当时很多的不公平，我记得都是靠记者来揭发的，我有这种打抱不平的感觉，现在我知道，要抱着这种想法去做就不对了，记者不是打抱不平，而是反映一些事实。”这种改变是有什么契机吗？

闫丘：那很简单。我从小很正直的，从小就是少先队员，大队长，黑白分明、嫉恶如仇那种人，我大概到中学，还觉得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但是进了大学整个人就变了。我高中的时候还是那种学生积极分子，宣传部

长，中学时候同学说我很有野心的，野心勃勃就是要当官的那种人。窜来窜去很厉害的，我跑去男生都害怕的特别马列那种。可到了大学一下子，心思就不在那儿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谈恋爱了。

记者：可是据说你大学也是很活跃的？

闫丘：大学的活跃现在想起来是挺小资的那种，就是经常活跃在咖啡馆、沙龙里面。那时候因为我家庭的关系，哦，我想有一个契机，我想是因为我妈妈的关系。

记者：家庭情况的改变是吗？

闫丘：很大的改变。因为我 4 岁跟我妈妈就分开了，我 18 岁的时候她再来找我的，所以一下子你会觉得你的生活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我多了一个妈妈了。我觉得我 18 岁开始变得忧郁了，开始写小说了，写诗了，恋爱了，然后我妈妈又这样出现，你就觉得，我的生活为什么这么坎坷，就是有这么多波折，跟别人不一样，我妈怎么突然之间冒出来，这样子，一下子好像变忧郁了。

记者：这让你更多思是不是？

闫丘：想得更多，静下心来想得更多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心里面，可能从小的关系，我爸妈家庭的关系，我一直希望人家觉得我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很不错的小孩。因为在上海，如果你爸妈离婚的话，你在弄堂里面会蛮受歧视的，尤其如果你学习不好。

记者：这让你感到创伤吗？

闫丘：有影响。所以我结婚比较早，我想就是有影响的，我一直想快点有个家。后来结婚后发现太早了，太早